

# 天主教在新竹縣的開啓與發展（1952-1970）

## 壹、前言

在 1949 年以前，基本上是自菲律賓來的道明會玫瑰省傳教士，在台灣進行福傳工作。在這個以西班牙道明會士為主的時代，檢查他們在台工作的時間，在同一年代，最多不超過 15 名神父在台工作。他們要照顧已有眾多教友的教友村，包括高雄前金、屏東萬金、彰化羅厝等地，在這些教友村約有一至兩位神父駐守。在這些大型教友村旁已有一些中型教友村，例如在前金附近有五塊厝及山下，在羅厝旁有員林、面前崙、番子田等。在西班牙傳教士之外，1936 年第一位台籍神父涂敏正晉鐸，然後到了 1944 年再增加了李天一、李惟添兩位台籍神父。此外，在 1941 年至 1946 年間，有日籍神父里脇淺次郎來台擔任台灣監牧區的教區長，同時有一位日籍神父協助主持台北樺山堂的教務。

在傳教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日本統治時期道明會士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彰化、雲林、嘉義一帶。除了羅厝，還分別有田中，斗六、樹子腳、埔姜崙等大堂；另外在台中有一大堂，台南有一大堂，但教友人數都不算太多<sup>1</sup>。除了彰雲嘉地區，道明會士的另一個傳教重點地區是台北。原因有二：第一、台北是清末以來的台灣政治中心；在政治中心建立傳教事業有具重要性。第二、十七世紀西班牙道明會士曾在台灣傳教，而他們傳教的地域就是北部淡水、基隆一帶。而十九世紀來台的道明會士，當然會想要繼前人的足跡，在此建立福傳據點。道明會士雖努力在台北地區傳教，但據 1940 年的教務統計，台北地區有 1540 名教友，僅占全台灣教友人數 9716 名的六分之一<sup>2</sup>。

對道明會傳教活動的另一負面影響是日人管制日趨嚴格。日本在 1939 年制定「宗教團體法」，1941 年建立「日本天主教團」，全日本的各教區皆由日人擔任主教，作為日本內地延長的台灣，也由日人里脇淺次郎擔任教區長。在里脇來台未久，日人就禁止西班牙道明會士在台南以南的活動。甚有被日人視為間諜嫌疑，加以拘留詢問。在此情況下，在 1941 年至 1945 年間，就不太可能發展新的教友點。然後 1946 年里脇回日本時，將管理台灣監牧區的責任，交給了

---

<sup>1</sup> 江傳德《天主教在台灣》（台南：聞道出版社，2008 年 1 月再版）頁 243~246，每個大堂約有教友兩三百人

<sup>2</sup> 同前

第一位台籍神父涂敏正。在此後兩年，涂敏正與西班牙道明會士，為教區長誰屬，曾有一番爭執。<sup>3</sup>在爭執的狀態中，有計畫的福傳活動也不容易展開。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可以瞭解為何九十年間天主教未在新竹紮根。道明會士並非有意不往此區傳教，而是因為有限的人力，再加上政治因素及教會內的紛爭，使其未能在此區域開始福傳。在 1950 年以後，當從中國大陸輾轉來台的傳教士以數倍的人力來台後，在新竹地區的福傳工作就順理成章的展開。

本篇文章不是正式的論文，大部份的內容是根據已有的一些記載翻譯或節錄而成，只有一小部份是個人根據這些內容所形成的綜合意見，因此功勞應歸之於沈起元神父、丁立偉神父、汪文麟神父、簡鴻模老師及各堂區紀念冊的作者。

## 貳、耶穌會士在新竹縣的福傳工作

### 一、耶穌會士來到新竹的原由

在 1952 及 1953 年，愈來愈多的耶穌會士，在遭受毀謗、囚禁、剝奪財產的痛苦，甚至還有人民公審及殘酷的監禁後被驅逐出境。在香港經過短暫的休養恢復身體的健康後，這些大部份中年的傳教士就被交付給副視察員殷保祿（Paul W. O'Brien）神父。副視察員神父寫信給總會長 Janssens 神父：

臺北的郭主教將會歡迎耶穌會士能提供給他的任何協助，而且在暫時的基礎上，將會允許耶穌會士在他的監牧區內，承攬任何工作。首先我們可以在一個臺北監牧區所屬的地區福傳，他已經準備指派給我們一塊能單獨傳教的區域…

臺灣很合殷保祿神父的胃口，因為這是真正中國人住的地方，有說國語的官員，也有土地從一開始就被交付給耶穌會傳福音。但殷保祿神父告訴總會長，與郭主教的合作是暫時的，因為即使是主徒會的 9 個神父（自 1950 年 1 月教廷將臺北監牧區托付給他們），都認為他們是難民。他們的心態是他們只是暫時的停留在臺灣，沒人能肯定中共不會攻打臺灣；而且若毛澤東政權崩潰，這些中國神父和外國神父被認為會離開臺灣，回到中國。另一方面，同樣被驅逐出境的教廷公使黎培理，在 1952 年緊急召集了殷保祿神父和其他修會的會長，請他們開始在臺灣的新工作，但應盡量避免接下任何土地的機構性的責任，像他們過去在中國大陸正式的作法。

---

<sup>3</sup> 古偉瀛〈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台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 年 12 月二版）頁 196~199

在殷保祿神父猶豫是否要接受臺灣的一個地區時，無預警地在 1952 年 6 月 1 日，揚州監牧費濟時主教（Eugene Fahy）、山宗機神父（Paul Beaucé）、楊耐安神父（William Ryan）、陶雅谷神父（James Thornton）等這些揚州監牧區的傳教士，都在遭受了十個月被監禁的痛苦後被中共驅逐出境。

費濟時主教是中國聖統制的一員，不需聽命於耶穌會會長，但他傾向於取得一個堂區般的地方，在那裡他可以和他的難友，這些加州耶穌會士一起工作，這樣比起回美國當一個失業的主教好多了。1952 年 6 月底，殷保祿神父寫信給費濟時，告訴他郭主教準備提供新竹，一個有 15 萬人口的城市，到臺北搭火車的時間少於兩小時的地方給耶穌會，在臺北工作的牧育才（Edward Murphy）神父請費主教趕快拜訪臺灣，有一個在中國航空工作的教友，可以提供免費機票。

在 1952 年 7 月 22 日，費主教和陶雅谷神父和楊耐安神父，這些從揚州監牧區被釋放的傳教士來到臺北，住在伯達書院，牧育才神父住的地方。數日後，費主教和陶雅谷神父開始了臺灣的傳教訪問。

副視察員神父 1952 年 9 月 2 日從碧瑤市（菲律賓）寫信給總會長，希望得到他的批准，派遣費主教及加州耶穌會士到新竹。內容如下：

郭主教著急的要在新竹地區福傳，費濟時主教同樣著急的要接管此地區，我的參議們都同意暫時地接管這個地區，好給我們的年輕傳教士一塊福傳園地。

去年當我訪問過臺灣後，我覺得新竹對我們的神父最適合。獨立地，費主教在訪問過臺灣後，也有相同的結論。雖然目前一位逃難的中國主教牛惠卿住在那裡，但他已獲得兩個新監牧區之一（另一個給了外方傳教會），使得新竹空出來了。

我們建議由費主教自郭主教處取得這個地區，在暫時的情況下，由他擔任總鐸，然後再由費主教邀請耶穌會來進行福傳工作，我們認為這樣做比較平順。

9 月 18 日總會長給傳信部長畢翁地樞機寫信，談到郭主教邀請被逐出中國的美國耶穌會士，去接受新竹地區。9 月 27 日，費主教以同樣的主題寫信給傳信部，羅馬聖部同意由「這些神父負責上述所說的新竹地區」，而且要求 Janssens 神父告知費主教這個允許。

從一開始，耶穌會就決定不要在臺灣接受任何永久性地法定工作。殷保祿神父堅持是在暫時的基礎上接受新竹地區。在總會長的部份，他指示在新竹地區的福傳工作不限定於一些美國耶穌會士，而是包括其他在中國傳教區的耶穌會士。

住在新竹大陸籍的教友們，多少會在聖誕節和復活節跑去臺北的教堂。有一位福建來的教友黃先生，經常每星期天去臺北望彌撒，爲了照顧教友的宗教生活，因此有一位神父每星期從臺北來，在這個教友家裡做彌撒，然後一個小團體慢慢形成。1952年1月，牛主教和張瑪竇神父（一位教區神父）在新竹安頓下來，牛主教和張神父在東山里租了一個房子，東山里位於新竹市的郊區。在牛主教將他的駐地從新竹轉到嘉義監牧區的斗六以後，郭主教就告知費主教可以搬到新竹，住在東山街的房子裡。

一切從1952年11月1日星期六，諸聖瞻禮開始，費主教用三輪車帶著兩個大箱子離開伯達書院到了火車站，兩小時後他抵達新竹。同一天，戴文彬修士，一位熱誠的匈牙利人，過去在揚州監牧區服務許久，從臺中北上，和費主教會合。在東山里2巷13號的房子裡，僅有一張桌子，四把椅子，一個炭爐。在那天傍晚，費主教買了一些筷子和碗，戴文彬修士下廚做飯，中華聖母會的修女們當日一直趕工，好在晚上來臨前，準備好兩床被子。

第二天，張神父好心地準備了一個茶會，讓費主教與新竹的教友們見面，他們都很高興，期望主教能盡快蓋起一座小堂，然後在偏遠的地方再蓋起一些小堂。

自1952年11月1日以後，費主教也被殷保祿神父委付擔任新竹地區的會長，負責管理原屬於中國傳教區，即將不斷增加被派往新竹的耶穌會士。殷保祿神父的計劃是將新竹縣30萬居民分成不同的區塊，分配給耶穌會在中國九個不同傳教區的傳教士，他們分屬不同國籍，不同會省及不同語系。這些傳教士將在相鄰的地域中工作，彼此不會有太多聯繫。不用奇怪，這時的耶穌會士尙未準備在臺灣去形成一個超越國籍的傳教區，總會長Janssens神父決定，在此時每一個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區保持他們的認同，儘管只是一個小區塊，但同時都在臺灣新竹有落腳之地。然後在歐美不同的耶穌會會省，過去被委派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傳教，現在可以繼續的珍愛及協助他們，好似擴大到中國的臺灣傳教區。耶穌會士在臺灣的工作，是依靠他們各自的帳房及各自的捐助者，來得到財務支援。這個系統由九個傳教區的帳房共同組成，包括安慶、景縣、徐州、蚌埠、上海、獻縣、大名、蕪湖和揚州，與耶穌會的里昂、奧地利、法語加拿大、杜靈－羅馬、巴黎、香檳、匈牙利、卡斯提爾及加州各會省相關。

在1953年3月2日，郭總主教和殷保祿神父簽訂一個協定，兩邊都爲期十五年，並且可以更新。總會長認爲，如果在十五年之內，這個協定因爲重大的原因必須被放棄，耶穌會方面應該在六個月前通知臺北總主教。「所謂重大的原因，

例如有可能可以回到中國」，或是政治的擾亂、戰爭等。當這些情況發生，耶穌會士被迫離開新竹地區時，合約就暫時中止。

臺北總主教代表耶穌會總會長任命總鐸，如同神父們負責堂區或鐸區。這些新竹地區的耶穌會士，在得到臺北總主教同意後，可以邀請其他修會或教友來新竹總鐸區工作。臺北總主教沒有責任，而是耶穌會有責任，去負擔新竹地區傳教士及傳教工作的相關費用。

雖然在這新開拓的地區尚未有教區的教堂或建築，在協議中已經對未來財產的歸屬做了清楚的說明。從新竹地區獲得的資產及利潤，或是傳教站、本堂、小堂，是屬於教會的財產，並且登記在臺北總教區名下。耶穌會根據教會法 497 條，有權興建修會的房產，如會院、培育院、避靜院等，他們可以持續擁有並隨意安置。給耶穌會或個別耶穌會士的奉獻、遺產或彌撒獻儀，屬於耶穌會所有。但信徒的奉獻或是彌撒中的奉獻，則由總鐸支配。

（節譯沈起元神父（Fernando Mateos）著 *China Jesuits in East-Asia: Starting from Zero 1949-1957*. Taipei: S. N., 1995.）

## 二、耶穌會士到竹東

第一位非美籍耶穌會士加入新竹地區是安徽德神父（Germán Alonso），直到 1951 年夏天，他是安慶傳教區的會長。他在 1952 年 11 月 17 日來到新竹。因為沒有人可以說清楚新竹地區不同城鎮的人口狀況，費主教和安徽德神父決定自己到處看看。這兩位先驅的耶穌會士，都穿著黑色的教士服，費主教另外戴著一頂白色的運動帽，而安徽德神父則戴著黑色的西班牙貝雷帽。他們坐著嘈雜的公共汽車，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他們在竹東、關西、芎林、新埔及湖口短暫停留，用國語詢問並作筆記。

在這次訪問後，費主教想要讓安徽德神父留在新竹，自己去竹東從頭開始，但殷保祿神父反對，因為費主教是揚州監牧，又被委任為暫時交付給耶穌會新竹區的總鐸，所以他應該留在新竹，與加州耶穌會士在一起。安徽德神父和其他安慶傳教區的西班牙人，則可以去竹東。依此原則，每一個不同傳教區的耶穌會士，當他們抵達後，應選擇一個城鎮及新竹縣的一個區塊。何時抵達，何時服務！

安徽德神父數次來到竹東，在主要的街道上走來走去，用普通話和學生攀談，希望找到一個房子。1953 年 1 月 21 日，他租下了南仁街 58 號的一棟臺灣房子，吉愛慈神父（Otilio Garcia）、葉方西修士（Francisco Pérez Yerro），這

些最近從安慶被驅逐的西班牙人，在 1 月 28 日來到竹東，形成了竹東最開始的耶穌會團體。

這三位耶穌會士是最先居住在竹東的外國人——「大鼻子」。竹東的居民對這些外國人全然無知，在那段時間，充滿好奇的談論他們。到了晚上，晚餐過後，這三位耶穌會士把椅子搬到街上，用普通話談天，一段時間後，慢慢有人開始接近這些國語說得比他們好的外國人。安徽德神父找到了 12 個教友，其中三個是老師，三個是軍人，他們來自中國大陸。

1953 年 2 月 8 日，費主教從新竹帶了一些教友來到竹東，祝聖了竹東的小堂，儀式隆重，並按民間習俗燃放鞭炮，以驅趕魔鬼。爆竹聲引來看外國人的好奇群眾，許多人要求傳教士開英文課程，傳教士們就可以在他們的課程中加入宗教的訊息。3 月 5 日，陳恩神父（Juan A. Garcia Castañón）以及王東儒神父（Francisco Jaureguizar）來到竹東，他們立即到公立學校教英文，一個到小學，一個到中學。陳恩神父還被軍醫院請去給醫院的職員及護士教英文。因為南仁街的房子不夠住，安徽德神父在商華街另外租了一個房子，租期一年，陳恩神父及王東儒神父在 3 月 11 日搬到那裡，並立即為辦公室職員開設了兩個夜間英語課程。英語學習的熱潮以及教師的慷慨，使得天主教教會在竹東的各種人群中被認識。

同時，來自安慶的吉愛慈神父及駱駿神父（Hilario López）在 3 月 31 日加入竹東的耶穌會團體，他們和一些附近的客家人家庭建立了友善的關係，並且在會院中開始了要理講授，福音的種子在客家人和外省人中萌芽。一個 55 人的望教友團體，包括學生、公務員、商人、秘書、工廠老闆，由吉愛慈神父及駱駿神父領導。到 8 月 15 日，22 名望教者許諾接受公教信仰然後受洗。吉愛慈神父是第一個學習客家話的耶穌會士。

安徽德神父瞭解到，竹東開始的福傳工作非常有前途，所以傳教區需要立即買下適當土地，用來當作會院、傳教工作的辦公廳，以及一個像樣的教堂。安徽德神父非常堅實的反對一種論調，認為這些被中國驅逐的傳教士，一旦大陸重新開放，就會放棄他們的新教友返回大陸；同時他也反對傳教士認為自己終會返回中國老巢的輕信。安徽德神父在河岸的另一邊找到了一塊 30 乘以 106 公尺平方的土地，位於一條通往火車站的新路旁，在那裏四週沒有房屋。1953 年 4 月 11 日（另一種說法是 6 月 19 日），教會獲得了這塊土地，僅花了 18000 臺幣。

安徽德神父在獲得臺北總主教及耶穌會長上的許可後，從大多是古巴的捐贈者處獲得了經濟支持，將建堂的計劃交付給羅以禮修士，一位建築專家。當時的計劃是蓋一座具有多項功能的大堂，在那時僅有數十名教友的情況下，這個計畫中的教堂似乎太大了，所以必須縮減。但不在預期中的教友增長，卻在六年後，使得竹東的耶穌會士必須在工業區興建另一個教堂和會院，而這個安徽德-羅以禮概念的教堂，則必須在 1964 年擴建成比原計劃更大的教堂。

1954 年 3 月 8 日，臺北總主教祝聖了竹東教堂，或許也是 1945 年以來第一個在臺灣興建的教堂。

### 三、新埔及竹北的耶穌會士

倪永祥神父（José Oñate），一個來自 Durango 的巴斯克人，是在新埔傳教工作的勇敢奠基者。「新埔」這個地名，象徵是耶穌會蕪湖傳教區新開闢的土地。倪永祥神父在 1953 年 2 月 23 日，一個寒冷的夜裡抵達新竹，他是第一個在新埔長街上散步的歐洲人。在接下來數日中，藉由幾位新竹中學老師的協助，他從一個女房東處，用 6000 臺幣租下一個二層樓房子，租期半年。

1953 年 3 月 9 日，張慕蘭神父（José Zamora）和桑朗度神父（Jesús Maria Zarandona）抵達基隆港。倪永祥神父直接帶他們到新竹，吃過晚餐後在羅以禮修士的協助下，三個蕪湖耶穌會士坐著卡車前往新埔。

在他們抵達兩天後，倪永祥神父和張慕蘭神父去拜訪新埔官方，然後他們去拜訪鄰居的家庭，後者歡迎這些天主教傳教士，期待他們為新埔的年輕人開設英文課程，甚至提議神父們可以設立商業學校。在此第一星期，他們只找到三個教友，其中一個是高中老師，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另兩個是警察。

1953 年 5 月 9 日，解佩義神父（Francisco Echeverria）、朗示明神父（Alfonso Barandiarán）以及狄世榮修士（Francisco Mendiburu）來到新埔，這個租來的房子顯得太小了。耶穌會士們在大街上找到了一棟更好的木造建築，在靠近新埔往竹北的邊緣，這裡本來是製茶的棚屋，已被棄置近兩年。房東參加英文課（認識了傳教士），同意將房子的一部份租給耶穌會士。這一部份包括兩棟獨立的房子，中間有一個庭院。當從捐贈者得到更多施捨後，他們進一步買下了大房子，他們因此可以計劃新的福傳計劃。

1953 年五旬節時，新埔第一批六位望教者被收錄。另外有一些學生有意願參加，但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固執的反對。無論如何，要理課程順利的展開，神父們在老師和學生中贏得了許多朋友。

齊理俠神父（Maximo Garcia Hormaeche），這位遭受一切剝奪，最後被驅逐出耶穌會蕪湖傳教區的傳教士，在 1953 年 9 月 24 日抵達新埔，與朗示明神父開始了在新埔地區的第一個傳教站。12 月 8 日，他們在竹北一個新租來的房子開了一個傳教站。在竹北居住著閩南、客家及外省人，使得此地形成最不一樣的傳教區，但也是最有發展的。（節譯沈起元神父（Fernando Mateos）著 *China Jesuits in East-Asia: Starting from Zero 1949-1957*. Taipei: S. N., 1995.）

倪永祥、張慕蘭、桑朗度、朗示明、齊理俠等神父，他們在新埔一家舊的製茶工廠，建立臨時的住所，並且尋找途徑將滿腔的宗教熱忱宣揚出去。首先是竹北，而後是鄉下客家農村：枋寮里、北平里、照門里，以及鳳山溪以南的六家、寶石和水汫頭等。雖然公車可以到達那些地方，但傳教士們還是喜歡騎自行車。他們先租幾間房舍，作為民眾聚會和宣講基督教義的場所，當神父們陸續完成在關西的客語學校六個月的課程，便在這些鄉村建立了傳教據點。

1955 年文國光神父完成在新竹的閩南語課程，擔任竹北的副本堂職務。1956 年鮑銳敏神父被任命為竹北本堂神父一年。同時，朗示明神父回祖國西班牙募集資金，作為建造教堂和福傳之用經費。

1955 年桑朗度神父自新埔鎮調來竹北，開拓福傳園地，先在台元工廠旁，暫租房舍作為臨時教堂。1956 年 10 月便尋得一塊適合建堂的稻田，購買後遂即興工，建造神父的宿舍及聖堂，即今日的竹北市天主教堂。

竹北天主堂是由雅讓修士所設計監造的洗石子外觀的兩層樓建築物，外表素麗內涵實用；一階階對稱醒目的階梯通往二樓聖堂，一樓則作為幼稚園、圖書室和兒童活動室。當時，仁慈聖母會的李聖心修女，就在此創辦了竹北地區第一所幼稚園—聖心幼稚園。

1957 年 9 月 15 日，竹北耶穌聖心堂落成啓用典禮。早上 8 點 30 分，郭若石總主教祝聖教堂，並主持彌撒和堅振儀式，由高欲剛神父講道。下午 4 點 30 分郭總主教主持聖堂落成啓用彌撒慶典，當天在教堂前面廣場上，至少有兩千人參與盛會；有些來自新竹，有些則從臺北遠道而來。

1958 年 2 月 25 日，羅馬教廷傳信部部長雅靜安樞機（Cardinal Agagianian）參訪本堂，由教廷公使黎培理、費濟時主教、郭若石總主教以及羅光蒙席陪同。1959 年 7 月，查理士神父、解佩義神父和文國光神父繼續竹北的福傳工作。解佩義神父還負責鳳岡地區的教務，創辦了一所幼稚園和一間診所。查理士神父、文國光神父則和兩個傳教員，成立了「健青會」，吸引周遭青少年加入。

#### 四、關西的耶穌會士

1953 年加拿大籍耿天道、馮道南、法良、葛民誼等四位神父抵達關西，數月後翁德昭、陳興華兩位神父暨龍在田修士相繼前來。同時也邀請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的修女加入，第一批被派遣到關西的修女有田冰清、劉玉潔、巴純一修女，後又得藍亞貞和李志達修女加入傳教的行列。第一任本堂為馮道南神父，承租西安里陳慶泉先生房屋為住所，並於 1954 年 1 月 10 日舉行開堂典禮。同年 12 月 25 日子夜彌撒時，就有五位教友受洗。1955 年 4 月 2 日，在教堂為一對夫妻證婚，這也是在關西第一次舉行天主教婚禮。

神父們因早期大部份在大陸徐家匯學過國語，但臺灣卻才脫離日治數年，一般人對國語尚非十分熟練。為能融入地方，便在南山里羅慶振先生處，租賃房舍學習客家話，這也就是新竹市華語中心的前身。且立即召訓傳道員，分派至關西各處協助神父們展開傳教工作。

馮道南神父眼見教友日漸增加，便積極在關西鎮正義路上覓得土地，更得其胞兄葛農先生慷慨奉獻，以每坪新臺幣 87 元的時價，購得今日關西天主堂 2350 坪的土地。於是著手建堂計劃，1955 年動工興建，計劃設建聖堂院舍、修生講課室、講道間、庫房等，新建耶穌聖心天主堂終於在 1956 年 4 月 15 日落成，落成彌撒由費主教在眾司鐸陪同下走進新的聖堂，舉行共祭祝聖禮。

新落成的聖心堂因氣象宏偉、佔地廣大、設備齊全，更為培育牧靈福傳事業相關人才暨天主教會教育事業，於聖心堂後設建規劃先進的完整學舍，自此耶穌聖心堂變成關西鎮天主教會的中心。而其高大宏偉的哥德式教堂，自完成之日起即成為關西鎮重要地標之一。

臺灣當時經濟落後、物資缺乏，很多人接受了美援物資後再接受天主教，因而在當時天主教被戲稱「麵粉教」。當時關西地區不僅交通不便、水電亦不普及，家中以蠟燭、煤油燈為照明；鄉間更常有三餐不繼情事發生，神父暨傳教員，經常見到家境困難之家庭而起憐憫之心。所以神父們有的返鄉募款、有的相互集資或向耶穌會申請經費，慶幸那時外匯差距頗大，國外的小錢，卻是國內的大鈔，著實發揮了極大的功能。

教會為讓幼兒能受到完好的照顧，在各村里設立托兒所或幼稚園，在南山里、北山里、明湖里、東光里、仁安里、錦山里、金山里、石光里、坪林里均普及設立，且教學設備佳、環境好，此為天主教會對關西地區諸多貢獻之一。又為

彌補關西地區醫療資源的不足，於石光聖母院成立醫療診所為鄉親服務。也有神父直接到學校教授英文，來彌補地方師資之不足。〈關西天主教會開教簡史〉

張金華修女曾回憶當時的狀況：

到我上幼稚園時，每到星期三的晚餐後，宋碧棧先生常在我家的天井講道理，他用的彩色掛圖講解得十分生動。暑期活動有兒童道理班，耿神父常騎著拉風的摩托車來接送我、大弟和李金桂到幼稚園上道理課，課後有令人期盼的牛奶喝。主日媽媽將我們穿戴整齊的上教堂彌撒及主日學，主日學課程結束就可初領聖體，而成為聖體軍。初中時的聖母會在星期六的晚上開會，有時我們不回家，就睡在修女院教室的桌球台上。張金華修女，〈發芽、成長、茁壯：慶祝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於關西傳教 50 週年紀念〉，《慶祝關西天主教開教 50 週年金慶特刊》。

當馮道南等神父在關西鎮市、郊區辛勤開教同時，西班牙籍臺北聖家堂的麥椿年神父卻獨自一人前往金錦社區另闢天地，展開牧靈傳教事業。麥神父於 1954 年先承租今日之金山飲食店二樓為傳教場所，並請當時方受完馮道南神父所辦之傳教士研習班結業生派往金錦社區、湳湖開拓教務，劉玉枝女士及原住民籍之羅吉源先生加入福傳事業，待一切穩定進入常軌後，麥神父即向家鄉募集資金，1956 年先建金山里的聖母七苦堂，繼建錦山李樹下亞納幼稚園及亞納堂，而後葛民誼神父集資再建錦山六曲窩的伯多祿堂。

麥神父見金錦地區無電，乃向家鄉募集經費，自籌總工程款 12 萬元之約 5 萬元的牽線費用（原預定總工程款 14 萬，故神父樂捐 7 萬，完工結算後，總工程款約 12 萬，餘款退還給神父），從此金錦社區的夜晚不再黑暗，象徵天主之光照亮了金錦社區的夜晚，神父造福地方功不可沒。

馬明民神父原任麥神父副院長，輔其教務發展，麥神父調職後，即由馬神父任本堂神父，其不僅個性謙和、福傳熱心，於音樂更有特殊專長，關西鎮第一支軍樂隊即由馬神父訓練而成。

1958 年，加拿大籍戴愛華神父向本地首富范朝燈先生購買約 120 至 130 坪農地，再向加拿大祖國親友籌募資金，完成關西鎮上林里的玫瑰聖母堂。慈祥和諧的戴神父頓使這偏僻教友們有信仰的聚會場所。

1957 至 1958 年戴神父寫了幾百封賀卡回國，向父母、親友展開募捐，並將此籌募經費設建富麗優美的坪林天主堂，成為本地的信仰中心。爾後再陸續設

建新力里、上林里東、西橫坑小教堂，並設立幼稚園、修橋、鑿井、鋪路等公共建設，造福鄉里。

## 五、湖口的耶穌會士

1953年2月23日義大利方志遠耶穌會神父與周迪民、池明雅二位耶穌會修士首批來湖口開教。1953年7月間勞民望神父首先來到新豐展開傳教工作。1954年租民房作為傳教站。隨著慕道者的增加，感到傳教員的需要，1955年李民德神父、勞神父開辦傳教員訓練班。以後又開辦幼稚園教師訓練班，當時該區教會共有十五所幼稚園。1960年10月18日新堂落成，新任本堂為方神父。

昔日鐵路經過老湖口，但日本人為了避免山路崎嶇，把它移至新湖口。1953年，在那邊，連一位教友也沒有。陶神父開始在那邊傳播福音。他從新湖口來到此地，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一年後，才在老街上買下了157號、157-1號、157-2號共3間作為天主堂，開始傳福音的工作，幾年後，教友人數竟也超過了200人；1959年，義大利籍的滿思謙神父（Fr. Marsecano，以下簡稱滿神父），來到了湖口老街，接續傳福音的工作，在這裡展開了長達8年的傳教生涯，為了讓在地的教友擁有更正式的聚會空間，1965年他花盡畢生積蓄，買下當年原作為湖口驛站的天主堂現址，籌建佔地廣大、宏偉莊嚴的老湖口天主堂，1966年10月9日，新教堂和神父宿舍正式落成使用，教友們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會堂，並將當初老街天主堂內附設的仁愛幼稚園，遷到教堂西側的位址，作為老街一帶居民幼教的空間。

就在天主教進入湖口的歷史時機，當年的湖口驛站，亦轉化為天主堂而被使用，就在省道進入湖口老街的丁字路衝點，十字架的光芒又重新點亮了燈火，扮演起湖口老街「門戶」的角色。

1960年代，天主堂剛設立的期間，因為臺灣經濟還在起步階段，各地普遍都有物資缺乏的現實問題，臺灣地區的天主教會得到國際上的支持，便利用各天主堂發放物資，當然，老湖口天主堂也沒有例外，至今，老街上多數住戶都還津津樂道當時到天主堂領取麵粉、罐頭的情景，也有人對天主堂提供安靜舒適的讀書空間，慰藉莘莘學子苦讀之需，特別感到溫暖。

當時在人們心中的老湖口天主堂，不僅是教友心靈寄託的場所，亦是美援時期居民領取救援物資的中心，身心的疲憊都在這裡獲得飽足，此外，更是無數老

街孩童兒時記憶深刻的地方，而那裡的溜滑梯、擺盪椅、旋轉馬，也曾經滿滿都是孩子快樂的嬉戲聲，與一旁虔誠的祈禱聲一唱一和，為美好的時光下了最美麗的註解。《在地十字衍義：新竹縣老湖口天主堂》

#### 六、橫山、北埔、芎林、寶山的耶穌會士

1953年9月，陸若伯神父在北埔鄉北埔街租彭先生的房屋開始傳教工作。1955年創辦幼稚園。1958年買下北埔鄉中正路30號之土地建堂，恭請臺北郭總主教蒞臨主持典禮。1960年，拯聖會修女來，協助幼稚園、開辦診所、傳教。

1954年雷德文神父和紀書年到九讚頭開教，為了福傳如何能把福音傳入民間並可使福音處處傳到。必須與當地人多來往，當時九讚頭還未有幼稚園，因此先租九讚頭165號（現新興村172號）之地開辦幼稚園，當時這兒是榨花生油、茶油場的木造的儲藏室。神父租下開辦了九讚頭的第一座幼稚園，取名義光幼稚園。1962年耶穌肋傷會修女接辦後改為育光幼稚園造福了本鄉的所有兒童們。神父們租現教堂斜對門148號為臨時教堂、宿舍並買塊土地準備建教堂，先買了現分局長宿舍後面的那塊土地因沒防火巷又沒馬路可出入，只有火車上的人才能見到教堂，最後和現教堂的地主交換土地。首先建教堂、禮堂、教室。這裡大多數的人工作與亞洲水泥廠或自己、他人田地、山上勞力工作，因此聖堂奉獻聖若瑟勞工主保為主保，取名為聖若瑟堂。

神父們臨時住在最後一間的閣樓上，第二年再建神父們的辦公室、宿舍。這兒也就是耶穌會法國籍神父（原河北獻縣教區）們的中心，包括橫山、尖石——新樂——嘉樂——秀巒、北埔、峨眉、寶山、芎林等。第一任院長廖迺邇神父是位活聖人，大陸淪陷時因信仰遭受百般侮辱痛苦坐牢。後到越南大修院又淪陷回臺灣高雄。柯其則神父理財務稱為理家神父。因九讚頭天主堂建立後附近的地段開始值錢開始繁榮，因地方人士讚賞教會帶來幸運。

內灣天主堂奉聖母升天為本堂主保。1955年首先由耶穌會士雷德文（Batricio Lestoben）神父傳揚天國的喜訊，後由范賓（Renato Faby）神父接捧。他的父母、親友及恩人的慷慨奉獻，建立了這座美觀雄偉的教堂。

當時內灣天主堂設於廟坪下方，現陳振雲先生住宅處，為日據時代之「南河瘡疾防治所」址，因內灣煤礦用採熱烈，外來人口遽增，1963年陳木匠振雲先生受邀前來和天主教建築師北埔教堂的潘修士合作與建現址。1965年新堂終於在鞭炮聲中落成起用並提供了完善的幼教服務，與神愛世人的教化工作。

法籍神父程萬里神父年輕時在上海傳教，大陸淪陷後被逐出境，回國休養後再申請來華傳教。1956年，他在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開始福傳工作，寶山鄉村民均是客家人，程神父開始學習客家話，同時也訓練兩位傳教員協助傳福音，程神父以他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帶領兩位傳教員一村一村去傳佈福音。程神父先在新城向呂老先生購地，對國外勸募建設基金，興建聖堂，於1957年落成，命名為小德肋撒堂。1959年開始在雙溪動工興建聖母聖心堂，翌年6月1日竣工。並於1960年設立孝愛幼稚園，為地方開發啟蒙教育。

### 參、耶穌會士在山地鄉的福傳工作

#### 一、耶穌會士在五峰及清泉

1955年孫國棟神父（Gerardo del Valle）抵達竹東後才開始五峰的傳教工作。孫國棟神父係西班牙籍耶穌會士，1952年被中共驅逐到澳門，1953年到臺灣，先在臺中參與拉丁文及協助西華字典的編纂工作，晚上學日語，兩年後由於編纂字典的工作不需那麼多人，所以被派到竹東，三個月後就被派往五峰鄉開教。竹東是五峰鄉原住民進出的門戶，因而成為耶穌會到原住民部落傳教的第一站，孫神父提及他為何會被派到五峰鄉傳教時口述道：

有一次，喬神父跟院長說，孫神父會日文，派孫神父去五峰傳教好了。結果院長說不行，他又不會抽煙、喝酒，怎麼可以去那兒傳教。1955年夏天，我和喬神父去屏東拜訪西班牙道明會的神父，順便去看看那兒的傳教情況，道明會的神父告訴我們，到部落傳教要用傳教員，喬神父覺得這個方法很好，並說如果他當院長就派我到山地傳教。回來後一個月，喬神父接了竹東的院長，我就被派到五峰去傳教了。（孫神父口述・2000/04/16）

1955年3月26日，耶穌會派孫國棟神父和葉方西修士到五峰傳教，孫神父是語言學家，來臺前在大陸安徽省的修道院教拉丁文學；葉方西修士是藝術家，很會彈奏風琴，是個極佳的護理人員，有語言天份，他們的共同點是會講日文，因而被派到五峰鄉開始了向原住民的傳教工作。

孫國棟神父和葉方西修士先是租用民房作為傳教之所，孫神父宣講福音，葉修士替人施診。天主教在五峰鄉的傳教工作非常順利，孫神父剛來的第二天就來了五十人，且主動要求神父派人到他們的部落去傳福音。孫神父的口述：

有一次我和費主教、喬神父到五峰來看地方的時候，有一個基督教的人，他主動找我說：「神父，我是基督教的，我可以給神父服務。」我說好啊。他就是葛廣禮，他曾到花蓮修過道，我就請他每天到竹東教堂，一個星期的功夫，我給他講天主教的道理，主要是講天主教與長老會不一樣的地方，他回去後，天天告訴人家：「天主教要來。」一個星期以後，我到五峰，我在聖枝主日前的禮拜六到五峰，第二天，有五十人來這邊彌撒。

第一個主日來參加彌撒的那五十人跟我說：「神父，我們那邊也要有人去介紹天主教的道理。」所以葛廣禮就給我介紹十二個人，分佈在各村，二個月的功夫，就在五峰這裡，我給他們講道理，我用國語講，葛廣禮幫忙翻譯成泰雅語，每天五堂課，他們白天到這裡，晚上就近住親戚家。二個月後就告訴他們可以開始回自己的部落傳教了。以後每個星期六要他們回到這裡，我給他們講星期日要講的道理，他們禮拜天再回自己的部落講道，這樣持續了一年，後來才慢慢蓋了教堂。當時傳教員的薪水每個月二百元。（孫國棟神父口述・2000/04/16）

葛廣禮向孫神父介紹了另外十一人，孫神父給予兩個月的密集培訓後，即派遣他們到各部落講道傳福音，天主教到五峰傳教的訊息立即傳遍各部落，很多沒有參加基督教的，都來了天主教，有很多原來是基督教的，也來了天主教。初傳時期的十二位傳教員，葛廣禮、蔣忠河負責五峰，高樹榮、高達來負責花園，呂金泉、林文勝負責竹林，謝義達、秋賢男負責桃山，趙忠良負責大隘，張應輝負責茅圃，呂國器負責忠興，宋金福負責和平，高樹榮、高達來、趙忠良三位是賽夏族，其餘為泰雅族。

五峰由於地勢陡斜，要在馬路旁覓得適當的建堂用地不容易，因此孫神父以二千元買下了現在五峰天主堂的這塊地，因為該地坡度陡又深，神父決定用搬土填地的方式整理地基，教友們跟神父說，「神父，我們沒有錢，但是我們有力量，可以奉獻給教會」，所以神父就請教友們輪流來幫忙搬土填地，五峰、花園、竹林三村輪流來，每天一個部落，每天 60-70 個人來幫忙工作，神父告訴教友們，教堂沒有錢，但是這邊有很多的衣服，你們可以拿去，每個人一包，不是當做工錢，算是當做禮物，就這樣在各部落族人的協助下，費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才完成地基的整地工程，教堂於該年 4 月開挖，同年 11 月 24 日宣告落成，由郭主教祝聖後啓用。

繼五峰天主堂建堂完工之後，各部落的教堂一一落成，1962 年忠興部落教堂落成，1966 年茅圃教堂落成，1970 年竹林教堂落成，五峰天主堂的傳教規模

大致抵定。至 1970 年年底，五峰天主堂共有五座教堂，登記領洗的人數共 1282 人，其中賽夏族佔 410 人。

五峰天主堂第一代的傳教員中，有高達來、高樹榮、趙忠良三位是賽夏族人，其中高達來、高樹榮住花園村比來部落，趙忠良住上大隘；第二代的傳教員中朱添丁、趙義文兩位是賽夏族，朱春景也曾接替高達來，在花園幫忙傳教工作，朱添丁、朱春良住茅圃，趙義文住上大隘，賽夏族的傳教員集中在趙、朱、高三個姓氏，北賽夏族領洗入天主教的信徒即集中在趙、朱、高三個氏族。

從五峰天主堂的領洗名冊統計，截至 1970 年止的賽夏族領洗人數為 410 人，其中受洗人數最多的是趙家，共 187 人受洗；其次是朱家，共 168 人，再其次是高家，共 43 人，這三家族合計 398 人，幾乎佔了賽夏族受洗人數的全部。其他家族受洗的有姓夏的九人，其中五人為女性，是嫁出而隨夫家受洗者，男性四人，其中有兩人是小孩受洗的，因此夏家受洗的很可能只有一戶；另外風、錢、潘各一名，皆為婦女嫁入才隨夫家受洗者。

節錄簡鴻模，〈五峰天主堂北賽夏傳教史初探（1955-1970）〉，《輔仁學誌：法管社科之部》第 38 期，2004 年。

因為距離比較遠，就發現一個人不夠，因此五峰變成兩個堂區；五峰和清泉，每一處有自己的本堂神父。宋恆毅神父負責清泉，當時還沒有教堂或房子，因此宋神父住在竹東，平日靠孫神父所培養的一位傳教員，宋神父就負責主日彌撒。這樣持續幾個月，直到能造就一個小小教堂與神父宿舍。在這個等待的時間，宋神父學了基本日語，因為年齡大的人日語比中文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他沒有學很多，但是至少在開始時會有幫助。

1956 年 5 月 20 日清泉有大慶祝，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主教親自主持彌撒，有很多人從其他山村以及平原來，在這台彌撒中有不少人領洗，彌撒後大家吃飯，原住民跳舞，然後客人回去，神父一個人在家。不過，很快傳教員來了。他是神父的幫手，帶神父去認識附近部落，這樣形成一個新的家庭。無論距離三、四個小時的路程，神父常拜訪家庭，使教友每個主日參加彌撒。

宋恆毅神父表示：

雖然我原來學了日文，但是很快發現日文不夠用，因為只有中年人講日語，孩子、青年和老人家都不會。泰雅語是共同語言，而學這個語言我碰到兩個問題，缺乏文字及文法，動詞的變化表示行動的不同，也很不容易。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用一種羅馬拼音。第二個問題比較難，雖然和原住民說話沒問題，但是他們

無法解釋語言。不過，有一位語言專家賀子緘神父幫助。他曾經很科學地學習菲律賓話，而泰雅語屬於同樣語言系統，因此他準備一個基本文法書提供很大幫助。身為老傳教士我也有另外一種語言，即心裡的語言，因此我能適應這個家庭生活。所謂的家庭就是一個神聖家庭。天主的恩賜是皈依的主要因素，而且教友很誠心，美國救濟品是否有影響信仰生活。另外一個證據說明教友的真信仰來自他們面對考驗的態度。1963年9月11日葛樂禮颱風帶來水災，將村莊的一大部分包括天主教堂沖走了。感謝天主只有一些個人東西損失，颱風過去後，要怎麼辦？神父認為建某物不是優先，因此，教友在學校的教室舉行主日彌撒，教友自己負責建造新教堂的大部分工作。1965年5月23日新教堂和宿舍開始啟用，比老的教堂好多了。（天主教新竹教區官網）

## 二、耶穌會士在尖石

1953年，一位在河北鄉下服務二十年的法國北部省耶穌會士紀書年神父（Joseph Jaeggy, 1908-1991），出任這個傳教區的院長。他首先決定在芎林鄉建立新的傳教中心，以便專門向務農的客家人傳教，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這些客家農民對天主教道理沒有多大興趣，很難改變他們的傳統和宗教信仰。兩年後，紀神父發現尖石鄉的泰雅族原住民對天主教道理很感興趣，對歸依天主有較大的希望。

我們可以從1955年3月10日，芎林的新院長和本堂紀神父所寫的信當中，了解初期尖石傳教工作的背景：

最近，我們發現一個有很大希望的新傳教地區，就是尖石鄉。去年聖誕節的時候，有一位美國神父用四部大卡車帶給那邊住在山區的原住民許多天主教的救濟品。過了幾天，三個尖石鄉原住民到竹東天主堂要求有傳教士去他們的部落講道理，但是竹東的神父們告訴他們應該去芎林找神父，因為尖石鄉是歸於芎林傳教區。他們到芎林找過我幾次，但我都不在。後來，我們申請了入山證到山上去訪問他們，在尖石部落我們碰見了鄉長，他向我們保證在尖石最少有500人會有希望在天主教會內受洗，他保證一定會幫助我們。現在已經有從尖石和水田來的三個男年輕人和三個女年輕人來到芎林接受傳道員的訓練。我祈求你們的祈禱，使我們的山上將會有優秀的本地使徒。

1955年12月19日，紀神父寫道：

7月時，我們在尖石鄉開了三個聚會所，每主日每個聚會所都有彌撒，這三個聚會所總共有 300-350 個慕道者。

其他在芎林服務的耶穌會士有時會來幫助紀神父，特別是穆啓華神父（Jean Motte），但都是臨時性的，沒辦法答覆越來越大的需求。那時，真正能幫助紀神父的是一些本地較優秀的男女青年。紀神父首先派他們去外面受訓幾個禮拜，青少年是在芎林天主堂受訓，由一位漢族傳道員為他們解釋《要理大全》的內容，他們一條條地背熟這些「要理問答」；女生則是在新埔仁慈聖母傳教會的修女院受訓，修女也教她們一些幼稚園的工作。這些本地的男女青年和他們的長輩不同，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國語，對紀神父的傳教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當時負責幫忙的兩個年輕傳道員，現在已經當祖父母了，他們被訪問時分享說：

為我們的傳教工作，神父給我們單薄的薪水，這已使我們很高興了，因為那時我們的家都很窮，但不是這薪水吸引我們幫助神父，最吸引我們的是有機會學習新的東西，並作一些很有意義的事。而這也是個好機會每週有幾天離開家裡去新的部落和認識新的朋友。

我們開始幫助神父在不同部落安排晚會。最先，人來是給我們面子，因為我們在尖石分發救濟品，但慢慢的，有一些人開始對天主教的道理有興趣，特別是因為天主教與泰雅族的傳統有不少相同的因素，例如：倫理方面。過了幾個月，已有不少全家要求準備領洗。

那時，有不少的新教友是脫離自當地的長老教會。他們那麼快歸於天主教會的理由，不只是由於紀神父的救濟品，更是因為 1955 年在尖石鄉部落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雲雪山先生很公開地鼓勵大家皈依天主教會，並且很清楚地解釋基督教是從天主教會分離出來的反抗派。這樣的看法，給水田大部分的家長很大的影響，那時只剩下住在部落高處最熱心的長老教會家庭，保留了他們原有的長老教會信仰。

1957 年 6 月 7 日本地主教首次牧靈探訪；當天，他給 113 人付堅振聖事，並且公開宣佈紀書年神父為尖石地區之本堂主任神父。紀書年神父不斷的擴大尖石傳教區中心。1963 年 6 月 19 日他的信件中說到：

我趕快結束初中男生宿舍與傳道員辦公室，明年我打算建立將來到尖石服務的肋傷修女會所需要的房屋。我已經買好了土地並已畫好了房屋設計圖。本工程會有

三部分：首先托兒所、婦女裁縫教室與女生宿舍；後來是診所與小醫院；最後是修女院。

1958-1963年，尖石神父們繼續不斷地在各部落給青少年、成年人領洗（每年約50-80人），同時每年給100-120位嬰兒和小孩受洗。這些人大都屬於1957年的家庭皈依模式（祖父母、父母、小孩在同一天或數月之後皈依領洗）。至1963年底，尖石傳教區的教友數目超過2000人，差不多佔全鄉原住民人口的五分之二，這個比例一直到今天沒有重大改變。1964年底，尖石鄉有2164位天主教友；2000年底，有2272位教友，其中573教友在尖石——那羅堂區，水田——嘉樂堂區有761位，玉峰——石磊堂區284位，秀巒堂區654位教友。

摘錄自丁立偉〈天主教新竹教區尖石鄉傳教簡史〉《尖石鄉開教50週年紀念特刊》

## 肆、綜合與檢討

### 一、初期福傳工作情勢

以耶穌會士爲主的大批傳教士進入新竹地區後，很快就獲得了大量的皈依者。從1952年至1970年爲止，新竹教區的教友人數到達最高峯的六萬人左右。觀察耶穌會士在新竹縣平地及山地的狀況，基本上他們沒有遇到外教人反對傳教的情形，這些中年傳教士來自中國大陸，這和他們在中國的經驗不同，也和清朝後期來到台灣的道明會士經驗不同。台灣的社會此時即使沒有那麼喜歡外國傳教士和天主教，但人們容忍了這些「大鼻子」在他們四周出現，雖然一般人對傳教士和天主教仍是敬而遠之的。傳教士們都能順利買下民房或政府土地，開始建堂傳教。

在眾多回憶文章中都提及，傳教士所握有的資源，是吸引人入教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普遍貧困的社會，傳教士手中有麵粉、奶粉、奶油及衣服。傳教士又經常從其歐美家鄉的教友處得到捐款；由於島內物價相對偏低、物資缺乏，這些金錢及物資的吸引力當然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可注意兩點；第一、許多傳教士否認救濟物資只發放給教友，因此即使有誘因，不代表領了救濟物資就成了教友。第二、爲了救濟物資而領洗信教，若缺乏之後的培育及變化思想，多半這些「麵粉教友」會逐漸冷淡或回復到沒有信仰的狀態。因此數萬的教友數字，仍必須從主日參與彌撒，參加堂區教友組織等去評估品質。

在台灣天主教史的研究中有一種印象，1950年後在台灣傳教士對於學習地方語言不積極。由在新竹縣傳教的耶穌會士驗證這種印象，可以知道是不正確

的。的確並非每一位耶穌會士都學了閩南語、客家話或原住民語，在尖石鄉的紀書年神父也是支持政府國語政策的代表，但主要負福傳責任的耶穌會士，大致上都學了當地語言。只是四五十歲的外國人，要再學一種方言，學的好壞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這種傳教士不重視方言的印象，一方面可能來自於對傳教士所說的方言無法理解，另一方面可能是說客家語或閩南語的新教友，許多人在日後又離開了教會。

由於大批傳教士從中國來到台灣，1952~1970 年間，新竹縣的傳教士人數呈現爆炸狀態，有的教堂有兩位甚至三位神父主持。在他們的指揮下，他們從最初培育的教友中選拔出適合者擔任傳教員（有少數是大陸來的老教友）。由於有相對充足的經費，這種神父為主，傳教員為輔的形式，大致上在整個新竹縣市都適用<sup>4</sup>。在這種神父—傳教員的架構中，神父扮演禮儀及聖事的角色，這種角色是傳教員所不能取代的。此外，傳教員經常站在傳教的第一線，對教義有興趣的非教友和神父第一步接觸後，繼續和這些非教友有更多接觸的常是傳教員；望教友的培育工作，多半也是傳教員負責。神父在這些培育工作中，主要是扮演查核和驗收的工作。

## 二、時空轉換後福傳問題的浮現

1961 年新竹教區建立後，首任主教杜寶晉的就任，基本上並未改變耶穌會在新竹縣市的福傳工作。杜主教邀請了一些國籍神父到新竹教區工作，但他心知肚明耶穌會士建立的福傳工作，不能只靠這些國籍神父，耶穌會各會省龐大的歐美聯繫網絡，提供給新竹縣市各堂口的資源，也都不是他能提供的。事實上，杜主教非常贊許並支持耶穌會士在新竹地區的福傳工作，當然在法理上，所有新竹教區的教堂都是主教的，但提供資源及人力的是耶穌會。

一百多位耶穌會士在新竹地區工作的榮景，是歷史上的偶然。原先從歐美準備來華的耶穌會士，加上國籍耶穌會修士在 1950 年後期逐漸被祝聖為神父，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仍足以填補年華老去的或是不適應在台福傳工作的老耶穌會士；但從 1970 年代以後，海外傳教士的人數，已經慢慢跟不上離去耶穌會士的速度，耶穌會士在新竹地區的福傳工作從開拓，轉為維持，然後到 1980 年代後，耶穌會士開始感受到維持已有一定的困難。杜主教在 1970 年成立了「四維備修院」，準備從小修生的培育開始，但對一個年輕的教區來說，穩定的修道人數基本上是奢想。因此劉獻堂主教接任後，他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傳教人力填補

---

<sup>4</sup> Fernando Mateos "China Jesuits in East - Asia : A Decade of Changes 1958-1967" p.52 當時在 1961 年在新竹教區建立時，全教區有 182 個神父、124 位修女、18 位修士、395 位傳教員。

的問題，他開始引進歐美新的傳教團體，以及我們以後看到的韓國、菲律賓及越南神父。

在教會的另一邊則是教友的減少。教友人數減少的原因很複雜，最主要是因為人口的遷徙。在 1970 年代以後，大量的鄉村人口移往城市，山地人口移往平地，青年們到新興的工廠中賺取工資，出外讀書的青年也在城市工作不再返鄉，這些都破壞了原有教會的結構。另一個原因則與教友品質有關，在天主教教會內，教友較少承擔維持堂區的責任，也較缺乏信仰的繼續深入培育，若信仰對教友成了「無味的鹽」，離開教會的人就逐漸增加了。第三個原因是教會內的磨擦，如教友與教友間的磨擦，教友與神父、修女或傳教員的磨擦、不同教友族羣間的不睦等，都會對教友團體產生不利的影響。第四個原因是物慾社會的吸引力大過教會，這些接受信仰未久的教友們，不少人迷失在金錢或權力的追逐中，在兩種相對價值觀的選擇中，慢慢忘了信仰的初衷。第五個原因是信仰的動機，如果開始時就是麵粉教友，又在信仰的培育過程中，沒有找到超性的人生目標，這樣的教友很難繼續留在這不給他們現世利益，卻要求他們服務奉獻的教會中。

在建立教堂穩固教友之後，天主教在新竹地區依照社會的需要，也開設了各種機構。首先是學校。耶穌會在新埔設立了內思高工，耶穌孝女會在竹東開設了上智小學，這些地區性的中小學數十年來，嘉惠地方不少。其次是社會事業，以竹東天主堂為基地，有竹東生命線協談中心、松齡會會館、婦女長春會會館，以後陸續整合為長安老人養護中心。此外在新竹教區新竹縣的範圍，有華光智能發展中心、世光教養院、藍天家園、竹北市老人安養中心、寧園安養院、方濟兒少之家等，對老幼孤弱者提供了大量的照顧服務。第三是醫院，現在日具規模的仁慈醫院，前身為仁慈診療所，對湖口地區的醫療服務有極大貢獻。這些機構成立之初多由各男女修會支持，但當神父修女去世後，若在各修會內無適當的負責人，同樣會面臨由何人持續經營的問題。當信仰不夠深入的教友，甚至非教友接下這個教會機構的管理權後，有的教會機構就會開始出現俗化，甚至名不符實的現象。

綜而言之，天主教在新竹縣目前的發展，面臨著不小的挑戰。這和天主教教會的結構有關，而目前的現況是在五十餘年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對前人事蹟的緬懷，不僅在紀念先人，也使我們可以從中學到經驗，提供未來教會與社會更融合，教會更有發展的希望。